

康爱德:冲破命运的咒语

康爱德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1873年出生于江西九江一户并不富裕的人家,由于家中已经有了五个女孩,她被父母送给邻家做童养媳。邻家请了算命先生给她算命,不料算出的结果是,这个女孩子命犯天狗,婚姻不利,邻家遂不敢接受她。正当家人无计可施之时,一位给西方传教士做中文教师的乡邻建议康爱德的父母,将她送给他所教的那位女传教士收养。就这样,美国传教士霍格女士(Mrs.Hoag)收养了当时仅两个月大的女婴,并为她取了个英文名字IdaKahn。从此,小康爱德在霍格女士与她的同事昊格矩女士(Jenny Hughes)的身边一天天长大,走上了一条迥异于中国平民女子的人生道路。

9岁时,小康爱德跟随霍格女士赴旧金山,在那里学会了英语。后来她又回到中国,跟着昊格矩女士在重庆生活了两年。1886年,重庆发生了反教运动,教会大院被夷为平地,传教士们躲进总督衙门,康爱德在一个木匠家躲藏了两个月,后来她们找机会逃出了重庆。当时正值春天冰雪融化,三峡江水很急,13岁的小康爱德坐着一条小船渡过了波涛汹涌的长江,她的人生又一次化险为夷。

1892年,昊格矩女士带了三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到美国,这两个女孩便是康爱德和她在九江教会女塾念书时的同学石美玉。她们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进入密歇根大学医学院。在学校,她们各项成绩均名列前茅。在毕业仪式上,两个女孩穿着中国旗袍登台领取毕业证书,康爱德的旗袍是蓝色的,石美玉的是粉红色,人们为她们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校长当众称赞她们:“无谓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与吾美之女

近代中国最早的女留学生(下)

◆ 张晶晶

作比例,愧无地矣!”

1896年,康爱德和石美玉学成回国,在九江码头上岸时,受到热烈欢迎,一路上鞭炮声不绝于耳,人们都想看看这两位留洋归来的年轻女医生。三天后,她们应当地医院的要求做了几台手术,手术十分成功,一时间声名鹊起。到她们行医的第二年末为止,她们共接诊治疗5491名病人,她们将所有收入移交给教会财政

部门,并用四年的行医来补偿在美国上学的费用。当时,张之洞曾写信给昊格矩,恳请派康爱德和石美玉去上海执教

他正在创办的医学师范学校,但她俩最终没能接受邀请,因为她们觉得留在九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次,南昌巡抚派船到九江,请求派一位医生去为他的夫人看病,康爱德立即出发,将患者带回九江悉心照料。巡抚夫人康复后,广为宣传这两位女医生,康爱德借此机会到南昌设立医院,并逐步扩展规模,仅1907年一年就收诊病人8000多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和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医院还收治了大量受伤难民。

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文,极力赞颂康爱德的成就,孰料还由此引出了一条花边新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读到梁启超生花妙笔下的“江西康女士”,不禁为之神往,并且从《申报》的报道中得知她“尚待字闺中”,于是托罗振玉函告汪康年及梁启超,请他们“为作冰上



康爱德

石美玉

人”,想要和她结为连理。

1899年,作为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女知识分子,康爱德代表中国出席了世界妇女协会会议。

1907年后,34岁的康爱德再次负笈海外,先后在美国的西北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文学,在英国的热带病院深造医学。四年后回南昌继续从事医务工作,直至1931年去世。

石美玉:把全部的爱献给病人

与康爱德并肩留洋的石美玉,出生于湖北黄梅,在江西九江长大。父亲是一位牧师,母亲在教会女塾任校长。石美玉是他们的长女,因没有缠足而远近闻名。

8岁那年,石美玉被父亲送到教会女塾读书,一读就是十年,并在此与康爱德结成终身好友,后来一同赴美留学,一同回国行医。她们以精湛的医术,赢得了江西百姓的信任。

慕名而来的病人越来越多,原先的小诊所显得捉襟见肘,石美玉

写信给美国的朋友,请求捐款相助。石美玉擅长交际,在美国颇受朋友欢迎,她的信发出不久就有了回音,芝加哥名医Dr.I.N.Danforth为纪念去世的夫人,愿意出资委托石美玉在中国建造一所以其夫人名字命名的医院。1901年12月,但福德医院(又名九江妇幼医院)落成开业,共拥有95张病床和完善的设备,石美玉出任院长。

为了传授医学知识,石美玉自己动手编教材,把英文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在她的主持下,医院逐渐发展,平均每月有千人求诊。为了医院的长远发展,石美玉二度赴美筹募资金。由于医院在美国享有良好声誉,所以得到了大批捐款,她回国后用这笔钱将医院扩充了一倍,接诊病人大量增加,仅一个月就诊治2743名病人。

石美玉的不懈努力赢得了人们的普遍信任和尊敬。有一段时间,她染病在家休息,九江知府竟出告示:禁止任何车马经过她门前的街道,以免影响她养病。石美玉受爱戴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15年,石美玉与伍连德、颜福庆等筹组中华医学会,曾担任副会长。1918年至1919年,她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进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研修。在美期间,她四处演讲,向美国教会介绍中国的情况,鼓励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

1920年石美玉回国,与昊格矩

一起在上海组织创立了伯特利教会和伯特利医院,还开设了两间药房和一所护士学校,她们还在家中收养了36个贫穷的中国孩子。石美玉是妇产科专家,慕她之名前来学医的学生遍及全国各地,还有的来自越南、缅甸、新加坡和檀香山。至1937年,共有600名学生毕业获得了中华护士会证书,并深入民间服务。

1928年,山东爆发大灾荒,大量难民涌进上海。一天,石美玉接到电话,得知有300名孤儿即将到达上海。她在一番祷告之后,到车站接回100名孤儿,决意将他们收养。她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孤儿院,附设小学和中学。这些孤儿长大后,她又将他们送入大学深造,其中不少人循着她的足迹,留学归来报效祖国。

抗战爆发后,原设在南市制造局路639号的伯特利医院被日军强占,乃迁至沪西白赛仲路(复兴西路)另设分院。医院派出医护人员每周到难民收容所和伤病医院义务进行救护工作,孤儿院则迁至贵州独山毕节。抗战胜利后,石美玉在美国积极筹划经费,在废墟上重建伯特利医院。1951年5月,石美玉请求上海市政府接管医院。1952年12月,伯特利医院更名为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

石美玉也是一个终身未婚的美丽女子,她把最美的年华奉献给了她挚爱的医学事业和她的病人们。1954年12月30日,石美玉在美国加州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1岁。

金雅妹、许金匄、康爱德和石美玉,是有史可考的近代中国第一批女留学生。她们生于政权交替战争频繁的乱世,独自异国求学,独自回国创业,独自扛起办医院兴女学的重任,其间必定经历了无数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她们身后,更多的中国女子迈出国门,走向世界,追求自由、独立和新知。

(摘自《档案春秋》)

生命接力

张子影



3. 闻讯

5月19日,是全国哀悼日。

14时28分,在绵竹金花镇,满眼触目惊心的废墟上,忧伤的汽笛声响起。所有的生命都垂下了头,连阳光也从厚重的云缝里透下几缕感念的光线。

汽笛声过后,救援的官兵和群众收起悲伤,继续进行紧张抢救。挥汗如雨的空降兵某团炮兵营政治教导员朱伟峰从人群的间隙里看见一个熟悉的人影,正连跑带跌地跑来。

来人是金花镇的书记耿坦。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灾难使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十岁。

跑到带队的团政委朱建军身边,耿恒的脚步还没站稳,就竖起三根手指,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响水沟里还有三个!三个!

地震过去整整一周了,居然还有三个幸存者。周围的人群一下子围了过来。

耿恒激动地哆嗦着,但还是清晰完整地表达了意思:有人受伤说,在响水沟工地,还有三个民工,骨折受伤生命垂危,急需救援。朱建军丢下手上的工具大喊道:朱伟峰!朱伟峰已经站在他面前。朱建军把手一挥:你马上做好准备,我向师里报告。

朱伟峰回到营地,一边准备,一边向熟悉的人了解情况:

响水沟又名三尖角,因大山的顶端有三个山峰并排得名。响水沟地处深山老林,磷矿资源丰富,里面山高坡陡,矿洞众多,平时就极难行走。前期地震造成山体塌方、道路艰险、地形复杂、环境恶劣,而且余震不断,随时都有可能诱发泥石流、山体滑坡,再加上地震形成的堰塞湖,使救援环境更加凶险,每一个进山的救援人员都将时刻面临生命危险。

可是,再危险也要去。被安排带队的副团长刘卫荣跑到朱伟峰帐篷前时,这里已经聚了一大堆人,原来是战士们听说要挑选人员组成救援突击队,便都抢着来报名,刘卫荣的到来算是给朱伟峰解了围。

朱伟峰迅速挑选了13名人员,加上刘卫

荣和他自己,一共15个人,其中6名是党员,8名是士官骨干。每人只带了3日份的给养,其他的负重能力全都用于携带搜救装备,如指北针、望远镜、地图、电台、砍刀、手电筒、救援绳、背包带等。

刚选好人,师长杨杰赶来了。杨杰一到,乱哄哄的人群马上安静下来。15个人装备整齐,齐刷刷地站在身材高大的师长面前。

外表粗犷,内心缜密的杨师长带来了向导——曾经去过响水沟磷矿的原安全科长朱开星,还带来了一样重要的设备:“北斗一号”卫星电话。事后证明,杨杰师长带来的这部临时从其他单位借调来的“北斗一号”在救援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杨杰详细地交待了救援注意事项,特别是险情处理方法,还简单地进行了战前动员。就在这时,有两个人悄悄地站到了队伍中,他们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随队医生——28岁的胡光俊和24岁的方庆。

望着这些战士们黑瘦疲惫的身影,杨杰感到说不出的心疼。部队到达灾区整整一周了,这些官兵们没有踏实地睡过一次觉,吃好一餐饭。从杨师长的内心来说,关于这次救援还有太多的细节没有讨论和确认,从红白镇通往龙宝坪这条路有“步步鬼门关”之称,其中的艰险,三天前从勇闯龙宝坪的戴玉强救援分队那里,他已经知道了。

那几天他和政委紧张得坐立不安。戴玉强、李少杰等人完成任务返回营地时,一向精神头十足的戴玉强累得连声音都发不出来了,只强撑着睁大眼睛伸出一只巴掌有气无力地晃了晃,就算向他这位素来要求严格的师长敬过礼了。杨杰则是冲上去把他们一个个紧紧地搂了一下算是回礼。

然而,杨杰即便心中有一百个不放心,此刻也只能按捺住了不安,叮嘱部属们谨慎行事,因为时间的确是来不及了——从地震发生到如今已经过去过了整整一周,在那个缺少食物、缺少饮水、什么都缺的地方,即便有幸存者,也必然已经生命垂危了。

杨师长以及包括刘卫荣和朱伟峰在内的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对的。在长达8个昼夜的时间里,赖元平再也没有站起来过。没有任何食物,没有水,没有治疗,到了19日,他细若游丝的生命,已经即将走到尽头。

16. 简约极致的来楚生

在现代艺林中,来楚生是一位书、画、印三绝的艺术家,其画清新朴茂、笔墨简练、格调隽逸,在现代花鸟画坛上独树一帜。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

他的家在苏州河南的一条旧式弄堂后面。颜梅华走进来楚生家。沿窗放有两个小写字台,一只工作写字用,一只画画用。中间有个小八仙桌,一只大橱,很逼仄,画画条件勉强强强,这与当时的一些名画家寓所不可同日而语。

颜梅华抬头看见小画桌对面有块玻璃牌,上面标明来楚生的画笔价格:花卉4元一尺,篆刻2元一字,书法2元一尺。这在当时上海画家中极其少见的低价。可以看出,来先生当时的生活过得比较清苦。对于这样一位书画大家在如此居住环境中,“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颜梅华顿生敬仰和钦佩之情。

来楚生平常比较沉默寡言,只有遇上对路的人,他才会变得十分健谈。颜梅华那时经常去看他作画,时间长了,他会一边教一边画。在颜梅华眼里,来楚生才气过人,独立独行。他从不 come 去刻意求人,更不会仰人鼻息。他固守着自己的良知和人生的立场。人生大抵是平凡的,画家也是平凡之人。他画画,似乎只是画给自己看,只是为了寄托对人生最美好的那份念想。

来楚生绘画有个特点,先画草稿,正式作画时,只考虑用笔,不太考虑构图。他的风格是八大山人一路,大写意,崇尚简练,粗犷,一笔就是一笔,极少复笔。画兰不画叶,简洁到如此程度。他曾反复对颜梅华说,“能简则简”“少则多味”,让颜梅华印象深刻。

他有一枝大狼毫笔,短锋,画点的,他最喜欢。他说这枝笔最称手,肯听话,画下去什么样就什么样。那天,他用这枝笔给颜梅华画一幅青蛙与荷花图。他的砚台很干净,画画时都用新鲜的墨。他用纸也讲究,要颜色干净,笔触看得清楚。他画的青蛙,寥寥几笔,来去笔路都很清楚。他说,这是他追求的风格。颜梅华观他作画时,有种胸有成竹之感。

来楚生虽不是健谈之人,但也时有爽直

之言。譬如,他会当着颜梅华之面,批评他老师吴湖帆画的竹子朱粉气太重。颜梅华后来反复观摩来楚生给他画的一幅扇面竹子,找不出败笔。内行看门道。竹子最难画的是相互间的关系,也就是笔与笔间的“眼”非常重要。而来楚生画的竹子将“眼”留得精彩无比。

来楚生的印章甚为精彩。作为吴昌硕的得意弟子,来楚生篆刻远师秦汉,辅以晚清流派,布局参差有致,奇趣扑人,刀法峻利爽直,瑰奇雄劲。贵能在吴让之、吴昌硕、齐白石诸大家林立之际,另辟新径,自成面目。当时请他刻章的人不少,颜梅华空下来看他刻的机会也多。

当时,上海印坛篆刻两大家,一是钱君匋,另一位就是来楚生。来楚生刻章与钱君匋的风格不同。钱君匋用的是薄刀,来楚生用的是厚刀。有评论这样说,规矩钱君匋,奔放来楚生。来楚生行刀时很沉静,不快,有时候会想半天,但一刀下去,不修,不改,旁边剥落就剥落些。他说这样有一种天然的神来之笔。

来楚生的理论是:“画是靠画出来的,不是改出来的。图章是靠刻出来的,不是修出来的。”

那个时代老一辈画家大都平易近人,不摆什么架子。颜梅华那时买到两方芙蓉印石,求来先生刻章。来楚生为颜梅华刻了“梅华喜神”三方印。来先生的图章擦干净后,刀法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那些最好的图章,用照片放大看,刀法笔触精妙绝伦。他的刀法犹如画画一样有顿挫,而他最喜欢的用石就是一般的青田石,价格便宜,材质也好,一刀下去很听话。他的图章,放大得起,也缩小得起,放得越大越耐看。

这就是来楚生。

当代书画篆刻大家钱君匋曾云:“来氏刻印七十年前所作突变,质朴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吴熙载、吴俊卿),亦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免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一人而已。”

来楚生至今似乎还不为大家所认识。也许,高人能懂的人永远是少的。

颜梅华传

周斌

